

李廉方先生学术传略

郭 戈

李廉方（1879—1959），名步青，字廉方，湖北京山人。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一生热爱并献身于教育事业，把教育与行政管理、理论探求与实际实验相结合，形成了系统的多方面的创造性的与实践统一的教育思想和理论。

李廉方从本世纪初留日反清直至建国后所经历的历次政治运动，都站在进步的或者民主革命的立场，同旧的反动势力和政权作坚持不懈的斗争，而且大都被历届新政权所任用。作为辛亥革命的元老他始终走着一条通过教育和学术事业改造中国社会、拯救劳苦大众的进步道路。

科举和旧学出身的李廉方，热爱祖国的文化和历史，热爱家乡，对教育史、辛亥革命史、地方史志等有较大贡献。他还致力于语言文字及其教学的研究，是“国语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倡导者和实施者。在作诗填词上也颇有造诣。李廉方毕生致力于学术研究，著述甚丰，据笔者所查，已知有200余种，其治学道路和思想很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一、早年时期 聪颖过人

1879年（清光绪五年），李廉方出生于湖北省京山县曹武乡

邓李场。其父李茂秀为举人，以塾师营生，养活一家六口人。李廉方6岁从父读书，初奠国学基础，少时有神童之说。9岁到天门县名塾师艾品南门下求学，适逢省学务官员视察，出一对联：

“冻雨洒窗，东两点，西三点。”他当即顺口对出：“切瓜分瓢，横七刀，竖八刀。”博得众人赞许。12岁，族人卖掉祖传基业——清明会田，资助旅费出府试，考中安陆府秀才第一名。后主考官出一对子：“举人为主人，主人退客三千里。”他对出：“明世为名世，名世自古五百年。”少年壮志，直抒情怀，由此可见其抱负之一斑。后得补廪生，又应乡试中举人。

1896年，经京山县教谕推荐入湖北经心书院，习经史、舆地、格致、兵法等科，后转入两湖书院。时清廷痛于国势凌夷，亟思图强，诏令兴办教育，开放留学。湖广总督张之洞颇孚清廷所望，莅任（1889）以来，锐意经营，湖北新教育和文化很有成就，在华中地区首屈一指，经心和两湖书院可谓其代表。特别是闻名海内的两湖书院，培养“出为名臣，处为名士”之才，只有获取功名者，方有资格入学。师长中开明之士，如监督蒯光典、王同愈、黄绍箕，教习姚晋圻、沈曾植、邹代钧等，对学生很有影响。李廉方回忆说：“个人在未留学以前还没有学校，曾在书院读书，对于中国学术，稍注意朴学。当时有名师教我，要求学问必有成功，必集中目的于一种专业。我奉行此旨治学并应用于求新知方面。”^①他与同学黄兴、时功玖、曹亚伯、贺子才、胡秉柯、但焘等不但学到许多新旧学，而且初步形成一定的改革思想。此外，据李廉方说：“少时治经史词章图算之余，粗习文字学”，^②对他以后研究语言文字及其教学很有帮助。

二、游学东瀛 矢志教育

1902年，为培养学堂师资，张之洞令派书院高材生留学日本。李廉方成绩优异，得膺其选。是年春夏间，与黄兴、张继

煦、李书城等东渡日本求学于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习教育、心理、论理、教授法、管理法等科目。同班上课的还有浙江学生周树人、汤尔和、许寿裳等。李廉方通过学习和对日本社会的考察，深感教育尤其基础教育乃强国之本。他说过：“我是最初留学生习师范教育之一人，因受教育学说之熏陶，感觉国家强盛不是少数人而是要全体国民都受教育。小学为国民教育的基础，所以我立志研究教育，必从小学起。回国以后，勿论办何项教育，不废小学研究。”^③为发展国内学堂，补济教材之不足，他与黄兴等湖北留日师范生于1903年3月在东京编辑出版《师范讲义》四册发行国内，内容包括教育原理、法制大意、小学教育制度、德法英美教育制度、国家教育学、学校种类及系统、师范学校、小学教授法、中学校、经济大意、地理大要、理化概要、生理卫生学、课外讲义和参观笔记共15种。该书“曾畅销数年”，是留学界也是国内最早、影响最大的教育学和师范教科书之一，为发展师范教育，传播教育理论和新学科，起到了很大作用。为求得专业学术上的进一步提高，李廉方又入东京高师学教育。

在日期间，李廉方还积极参加反清活动。1903年1月，他与刘成禺等在东京创办了影响颇大的《湖北学生界》月刊，并任该刊地理栏主笔，撰有《中国地理与世界之关系》、《黄河》、《地理与国民性格之关系》、《扬子江》等文。同时创设昌明公司，又与蓝天蔚等在同盟会未创之前，曾密结排满盟约。这些活动有力推动了辛亥和湖北革命的发生。

三、归国以后 暗中反清

1903年夏，李廉方因排满嫌疑被勒令返国，并逐出省。先赴天津教学，旋返武昌赁居花园山。在其寓所里组织领导进步师生20余人秘密集会，讨论革命方略，隐然以领导自任。“花园山聚会”开了湖北革命组织的头，启迪和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青年，因而获

得辛亥革命史学界的高度评价。不久，“花园山聚会”被清吏察觉，李廉方再次被逐出省。应同学胡元倓、黄兴之邀，赴长沙任教于明德学堂，与同事刘佐楫、张继、王正廷、苏曼殊等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并主经心学堂教务。后任湖南京务处史学专员兼长沙中路师范历史教习。曾在清肃王府教读一年。

1906年春，张之洞创办两湖总师范学堂，李廉方返鄂任该学堂历史教习，在讲课中有意传授新思想，并积极营救被捕的日知会成员。后历任湖北师范学堂堂长、方言学堂监学、艺师养习所总理、省视学等职。他也很注意教学、研究工作。比如，联合学界在其寓所发起湖北教育会，并代表鄂省参加全国教育总会联合会议；倡言实用教育，反对教育脱离实际；注重参观或代授国文课，研讨国文教学问题等。

辛亥首义成，李廉方因长期从事反清活动而被推为鄂都督府秘书长，任事不及一月，偕季雨霖成立安襄郢荆招讨使行署，任军事顾问官，收复鄂西北大片土地，一度任襄阳卫戍司令兼署襄阳道。南北议和，被任命为湖北教育司副司长，不就，因新政府里几乎成了清一色的旧派人物。1912年7月，李廉方代表湖北出席了“征集全国教育家于北京”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会上他力主将武昌首义日定为国庆日，推倒了政府拟定三个日期的提案，获大会及后来国会的通过。

四、中华书局 充任编辑

1912年，陆费逵等创中华书局，邀李廉方及范源濂（编辑长）、梁启超、王宠惠、李登辉等充编辑，与商务印书馆竞争。李廉方在书局潜心研究，著书立说，先后出版《新制修身教本》四册（1914）、《中华女子高等小学修身教本》三册（1914）、《新制各科教授法》（1914）、《新制教育史》（1915）。兹作一简介：

《新制修身教本》“第一至第三册论述修身，第四册述论理大要，全书以最进步之修身教授为标准，多采经训，而对西哲学说亦不偏废，为现今修身教科第一善本。”1919年该书印达6版，到1922年仍在印刷之中。

基于高小以男女分校，男女教育不同，中华书局“延聘通人（指李廉方等人——笔者注），特编女子高等小学用书，历时经年，累加修订……”。教育部对先生所著《中华女子高小修身教本》批语曰：“是书条理清晰，意义显明，实为难得，应即审定，作为高等小学教员图书。”

《新制各科教授法》第一编总论，论教授的要旨、材料、方法和阶段；第二编述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等12科要旨和方法；第三编单级教授法，讲单级学校、设备、编制、教法及二部教授。适用于师范学校，集“编者十数年之经验，语多精审”。

《新制教育史》分绪论、我国禁海前之教育、世界新教育之潮流、清季教育及民国学制四章，文言体，师范学校适用。到1922年3月印达13版。教育部审查批语曰：“是书叙述中外教育盛衰及学术异同，多用比较立论，且于近年所说纲罗略备，具见匠心……。”^④这些都是我国较早的修身、教授法（即教学法）和教育史教科书或专著，已得到当前教育史学者的肯定。比如，《新制教育史》为“中国教育史研究发轫期（1912—1927）”的代表作之一。^⑤据笔者查考，《新制各科教授法》是最早国人自编的各科教学法著作之一。从此，李廉方与编纂教科书和中华书局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我国教科书编纂和发展有重要贡献，其主要学术成果大都出版于中华书局。

1914年初，《教育杂志》社以“实用主义教育之新研究”为题，举办悬赏征文活动，李廉方的《今日学校教育应否采用实用主义》一文获得头奖，后又收录到《教育杂志》增刊专号的头

篇。该文发展了他于清季提倡的实用教育思想，全面深入论述了实用主义教育问题，观点独到，材料丰富。他与当时的黄炎培、庄俞等所倡导的实用主义教育，还是当前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种思潮推动下，中华书局推出一套“实用小学教员讲义”，李廉方及范源濂、杨保恒等人“皆名誉夙著，极有教育经验”，担任该丛书的编纂工作。本讲义分三部分：普通教育学部，包括教育学、儿童心理学、教授法和管理法；单级教授部，有单级教授法、管理法、改良私塾法；基本知识部，有修身、论理、算术、历史、地理和体操。并附有各种教授案、各科教法研究、教育法令、参观小学记等。

五、调教育部 任职编纂

1915年5月，教育部设教科书编纂处，先后聘李廉方、熊崇煦、陈润霖等为编纂员，主要从事小学国文和修身教科书的编纂、研究工作。当时国内纷乱，此教科书仅昙花一现，未能推行。此时，李廉方与黎锦熙等人“主张国文宜改国语”，^⑥并在《中华教育界》上发表《国民学校国文教授之新研究》（1916年1、2月）。该文主要论述了中国文字和文法问题，前者包括我国文字的特质、特殊教授之方法、以及字数、字体、字音和笔顺等，后者包括汉语文法教授的经过、各国文法教授之沿革及文体。

袁世凯死，李廉方被任命为内务部秘书长。1917年春，又返教育部任视学，并视察湘鄂两省教育情况。同年，与范源濂等合校《青年宝鉴》一书出版于中华书局。9月，被任命为山西第一任教育厅长，但他与奉天、吉林的教育厅长黄炎培、钱家治辞而不就。后与路孝植赴日考察，著有《考察日本实业补习教育记要》

（1918）出版于商务印书馆。该书对日本实业补习教育的经过、现状、管理、训练、奖励办法与外界联系、以及工商业、农业、

女子补习教育等方面作了详细介绍和分析，最后专就我国发展实业补习教育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1918年秋，教育部召开中学校长会议，议决了在清末民初多有反复的文实分科制。但李廉方与北大校长蔡元培对此案不甚赞同，均有文论。他的有些观点曾为江苏教育会及教育部所引用和采纳。他还就文实分科案与陆规亮、童斐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展开多轮论战。翌年2月，李廉方任视学会议驻外专员，视察北京各小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南京高师、以及湖南和吉林的教育，撰有《改正吉林小学教授意见书》（1920）一本。4月，北京政府建立国语统一筹备会，李廉方、张一麟、吴稚晖、蒋维乔、袁希涛、胡适、钱玄同、高步瀛、黎锦熙等当选为委员。会上，李廉方提出了第一案：改注音字母名称案，又与胡适等组织委员会办理国语统一、词文典编辑等案事宜。他始终是国语运动的倡导者和实施者，极力鼓吹国语统一和言文一致，尤其擅长国语或国文教学和教科书的研究和编纂。此段，他著的《小学国文教授实际之研究》的长文连载五期于《中华教育界》（1919年9月至1920年1月）上，为其早期研究国文及其教学的代表作。另撰有《中学校制度之商榷》（载《教育杂志》1920年9月），并与陆懋德编译新教育派克爱伦的《儿童教育论》（载《中华教育界》1920年2、4月）

六、出任厅长 力主教改

1920年8月，李廉方出任河南教育厅长。身为教育学者，他首先对豫省教育诸方面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拟定了改革该省教育的三个计划——《义务教育实施程序》（1920）、《整理河南教育计划书》（1921）、《新式国民学校计划书》（1921）。他上任后，积极筹办义务教育，颁布施行义教规程及筹备程序，成立省垣义务教育委员会，创办义务学校，还呈请省长酌拨省款

补助推行义务教育。他在《新式国民学校计划书》中又从课程、编制、设备和教师四方面论述了改革国民学校和义务教育的观点。教育家俞子夷在《和李步青先生讨论新式国民学校计划书》

（载《教育杂志》1922年1月）一文中，对其评价甚高：“……他的这种计划书才是真正研究教育，才是真正计划义务教育……这计划书在中国官厅出版物里，可以算得破天荒的著作；就是民间出版物里也没有和他一样的有系统，有组织。”在李廉方的锐意经营下，河南义务教育跨入全国先进行列，他本人也被选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义务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后改为书记）。

《整理河南教育计划书》是他主持豫省教育厅的施政纲领，从教育经费、考核和教学三大方面阐述了改革教育的设想。教育部对该书的评价是：“条理井然，筹划周至，具见热心教育，且为目前计划，不事扩张而重整理，用意尤是。”^⑦在教育经费上，李廉方对河南是有贡献的。在其数次努力下，划契税为教育专款，并组织专款监理会监督使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开封开会，关于教费，各省区代表都认为以河南为最好。教费独立促使河南教育的发展，各级学校颇为受益。

李廉方任河南教育厅长时，正是欧美新教育、实用主义教育在旧中国最受盛赞的时期。对现代教育思想和教学法，他甚为关注，并亲自试验。李廉方是我国较早重视和推行教育实验者。他不仅请专家俞子夷、王克仁等到省会专讲设计教学法，而且在1922年他开办五所小学专门实验设计教学法。虽然因种种原因，实验未著成效，但给其以后的实验成功奠定了基础。同年，他著文对教育会联合会议决的“新学制系统草案”陈述意见（载《教育与职业》1922年2月），且就中学级任制与贡沛诚等在《新教育》（1922年8月）上展开讨论，还在《新教育》（1922年10月）发表了论述义务教育的长文。教育部鉴于学制改革之议风行全国以及李廉方在此方面的研究，特于1922年9月指派其为学制

会议会员，参与新学制即“壬戌学制”的讨论、修改和制订工作和。第二年六月，李廉方改任教育部编审员兼审查股干事，主要研究小学教材，发表有《小学教材之商榷》（载《新教育》1923年3月）。该文主要观点认为教材是达成教育目的的工具；强调“学习心理的教材程序”；主张“设计课程”、“大单元设计”，既不拘泥于分科又不失科目的独立。

七、高等学府 就任教授

1923年夏，李廉方应好友武昌高师校长张继煦之邀任该校教授兼事务主任。他尽力协助校长管理和改革校务：添女生宿舍，实行男女同校；修正学制，废除年级，采用学科单位制，用学力编制法；改校名为武昌师大并任总务长；将原四部改为八系并在哲学教育系主讲小学教学法和小学教材。同时，不废教育研究。至北伐期间，在《初等教育》（1924年6月）、《中华教育界》（1924年8月，1925年9月、12月，1926年2月）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有关小学的教学历程、教育经费、国语文学读本、国语儿童文学和根本改造等方面的论文。又应中华书局之聘，编著出版了初高级的《国语文学读本》八册（1925）、《国语文学读本说明书》（1925）、《国语文学读本》四册（1927）、《国语文学读本教授书》四册（1928），作为“新小学教科书”向全国发行，不但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小学教育理论，并且为宣传和推动国语及其教学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他还主持了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湖北方面的教育测验调查工作。

北伐告成，李廉方应旧友张继之邀，任北平政治分会首席秘书兼代秘书长。他曾编著《三民主义纲要》（1929）一书出版于中华书局。1926年元月，李廉方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李书华、胡适、钱玄同、赵元任、周作人、林语堂、刘半农、许地山、黎锦熙等人当选为南京政府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委员。

8月,李廉方再次赴汴任河南中心大学教授兼文科主任及教育系主任。他一上任即改革大学教学,撰写并试验“大学研究室实施计划”(载《文科季刊》1930年1月),效果甚佳。“这种办法在大学中还算是初次成立。”^⑧翌年8月,河南中大改称河南大学,李廉方又改任文学院院长兼教育系主任。他又提出教育系附设实验学校计划和预备工作计划(载《河南教育月刊》1930年10月、11月),并对陈鹤琴、廖世承所编的国文测验提出“批评”,自己编制了一个小学国语测验标准,包括“识字测验”和“文法测验”,特别注意“切近于实际”和中国文字的特点(载《河南教育月刊》1930年11月)。李廉方在教育系主讲现代教育、实验学校设计、小学课程论和教学法等课,深受学生欢迎。他十分注意引导学生参与一定的研究工作,并兼任学生教育研究会和社会学研究会的指导员,给学生以很大促进。

1931年9月,经李廉方提议,河南教育厅成立小学教育实验指导部,由他任主任主持实验。李廉方认为,过去十年的实验因是模仿抄袭,故其结果多归失败。于是他试图根据社会实际,探索新的实验路子。其实验分两大部分:一是“整个实验”,主要在低年级中进行的以儿童为中心联系儿童生活的设计教学;二是“部分实验”,又分“小问题实验”和“课程改造”两类。实验两期,效果尚可,不过与其初衷和设想还有差距。第二年10月,李廉方将其扩大为开封城厢小学及民众教育实验区,旨在负责关于这方面的调查、视导、设计、研究和实验事宜,在于沟通教育厅、河南大学、开封教育机关的联系,以谋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他认为,对于当时教育袭貌遗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首先应从小学和民众教育实验入手。为此,他创办了《开封教育旬刊》(1932年11月),刊登了实验区的调查统计、召集会议、设计及建议、实验研究等工作。其中尤以二重制的实验较有影响。其目的是运用分类作业,适当排列,使教育设

备上表现二重使用的功能，以较少的教员和设备，而获得较多的效果的一种经济的办法。实验两年，成绩颇佳，不少学校仿效。教育部督学周邦道曾参观过两次，不仅在江南大讲“开封试行的二重制”，且撰文《二重制之理论与实际》（载《江苏教育》1935年3月），详细研讨了这一新的教学编制。

李廉方从事实验后，全面研究教育诸方面的问题，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教育改造、教育实验、教材教法、乡村教育、学科测验等方面论文，发表在《开封教育旬刊》、《教育周刊》、《乡村改造》、《河南教育月刊》等报刊上。并主持编写了《实小教育》（1932）、《二重制实验报告集》（1933）等册子。除实验、研究工作外，他也积极参加许多校内外社会工作和教育活动。如任河大抗日救国会主席，指导出版《河大抗日救国旬刊》和揭露日本侵华历史书《抗日血钟》，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组织中学国文教材讨论会、小学教育讨论会、国语教学研究会；与邵爽秋教授联同教育界人士发起六月六日为教师节，成立教师节开封筹备会；与邵爽秋创办《教育周刊》（1932年11月）等等。

八、教育实验 指在开封

李廉方为实验其教育设想，创造新的教学体系，于1933年夏辞去河大文学院院长及教育系主任，专任开封教育实验区委员会委员长。他在委员会下设了八个部门：大花园教育村及实验学校、杏花园教育镇及实验学校、教材部、儿童科学馆、卫生教育委员会、测验部、《开封实验教育月刊》编辑部和区本部，全面开展工作。第一年，其实验方案还未写出，全靠口授，加之个别具体实验者对其实验意图不甚了解，所以工作未有起色。第二年夏，李廉方吸收了不少刚从大学和师范毕业的学生，其实验方案是：

《改造小学国语课程》三册（1934，1935年），并出版了《小学低年级综合课程论》、《国语基本字研究》、《国语算术计划纲

要》等（以上均为1934年）。虽然面临经费、人员、机构裁减等困难，但他们顶住种种压力，在两处“极贫穷的”农村和小手工业区集中的地方脚踏实地地搞实验。时间把他的思想和方法的效力渐渐地显现出来，事实昭示出他实验出来的学生在各方面的进步都比一般学校快得多。李廉方从整体改造和国情出发，在课程、教学编制、教学历程、教法、学龄和教学时间诸方面的实验与现行的教学体系大不相同，而且效果极佳。因其“以一般小学学龄儿童二年半授课时数修完部定四年课程”，经济而有效，初名“二年半制”；它在识字教学上颇有成效，且不采用课本，应用卡片之处甚多，又称“卡片教学法”或“卡片识字教学法”；又因实验课程有合科、综合的思想和组织，遂名之曰“合科教学法”；1936年10月，河南召开教育行政会议，正式更名为“廉方教学法”。而且，以上称谓均有相应的论著，如《二年半修完部定四年课程概要》（1936）、《廉方教学法》（1937）、《合科教学法讲义》（1938）、《卡片教学纲要》（1938）、《合科实验的廉方教学法》（1939）、《最经济的合科教学法》（1940）等。此外，他还著有《儿童读物审查》（1935）、《普通教学法》（1935）、《实验义务教育学校实验计划》（1936）、《国语算术课程纲要》（1936）、《我国古代的小学教育》（1937）、《廉方教学法习字基本练习》（1937）等。在他的主持下，实验区出版了一系列“小学教学活动纲领及参考资料”，如《相国寺》、《龙亭》、《禹王台与繁塔》、《铁塔与惠济河》、《岳飞与朱仙镇》、《包拯》、《儿童节纪念》、《总理逝世纪念》、《国庆纪念》、《九一八国耻纪念》、《五九国耻》、《云南起义纪念》、《淝水之战》、《民族英雄史可法》、《新年》、《端午》等，还出了有关开封地方的《民众读物调查》、《民众迷信调查》、《民众娱乐调查》。

李廉方主持开封教育实验区实验的“廉方教学法”，曾引起国

内新闻界、教育界的关注，一时间影响很大，参观者络绎不绝，都给予高度评价。1934年12月29日《大公报》在《开封实验教育的异彩》的专评中称其“在沉闷的教育界中，可谓放一异彩……全国教育尤其小学教育，定受最重大的影响无疑”；1936年10月下旬又以《开封教育实验区试验新教学法成功》为题连载三日。黄炎培参观后在当时《东方杂志》（1935年7月）上用大量篇幅介绍，解放后又多次说到：“李步青老先生所发明的识字教育办法是绝对有效的。我何以断定为绝对有效？因为我是亲身试验过的。”^⑨俞子夷评说：“所实验的是一种根本的彻底的全部的改革方法……。”^⑩1936年春，教育部长王世杰专函询问实验情形，决定由部向各省市实验区及实验学校推广。10月，河南教育行政会议决，全省各县设实验班，采用“廉方教学法”。另外，江问渔、孟宪承、艾伟、朱有光、肖承慎等专家或前往参观，或给予高度评价。教育实验专家王秀南在《十年来中国实验教育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华教育界》1947年1月）中认为，李廉方的教育实验是国内抗战前最著名的教育实验之一，“确是一种有效的实验”，在“学校编制”、“缩短学年”、“国语教学”上有重要贡献。现代台湾学者（如徐珍、司琦等）认为：“廉方教学法最大贡献，尚不在经济教育年限，而在革新过去我国教学之弊端，而创一种适合国情的教学法”。^⑪“廉方教学法”为国人自创教学法或教学法中国化的主要代表，已为海峡两岸教育学者所共识。

九、抗战以后 建国前夕

1938年，日寇进犯中原，开封教育实验区迁到河南西南部的镇平县，李廉方也于此时应教育部之聘任实验教育教材编辑组主任，先赴武汉，后随部入川，专门负责办理实验教育训练班，推广其教学法，并编写有关材料十余种。同年，实验教材编辑组改

为教材编译组，嗣后并入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李廉方任主任。1942年元月，改任特约编辑，翌年11月，又任国辅会委员。从1940年至1945年间，李廉方被推举为代表湖北的第二、三届国民参政员。因对日作战等原因，其思想和实验则无法推行，为此他甚为苦恼。有人劝他说：“教育部给你这么高的待遇，别人都很羡慕。您也老了，省点事，不要再要求实验或推广您的方法了。”可他回答说：“他们不知道，我不愿拿钱不办事。”^⑫这时期，他又在《教育通讯》（1938年7月，1939年1月、2月、12月）、《教与学月刊》（1938年10月）等刊物上发表许多有关合科教学法、卡片教学、儿童读物、识字运动、义务教育等方面的论文。

抗战胜利后，李廉方应聘任湖北通志馆总纂兼副馆长。这时他已年近70，可他仍每日清晨步行上班，研究辛亥革命史和地方史志，从不间断。他主持了“鄂故丛书”的编纂工作，自己编写了《辛亥武昌首义记》（1947）、《新修京山县志草例》（1947）、《京山新志·舆地志》（1949）等书。其中《辛亥武昌首义记》详细记载了辛亥革命，尤其是湖北革命活动的前前后后和他的所见所闻。是书分上下卷，语言精炼，内容详实，常被援引，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重要文献，不少论著称该书的史料较为可信。

建国前夕，李廉方与李书城、张难先等在湖北发起反蒋和平运动，成立“和平促进委员会”，带头发起赞成中共八项和平条件的签名运动，后又投入反搬迁、反破坏斗争。1949年9月，李廉方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建国后，任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中南军政委员兼教育部副部长，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员兼第一届政协副主席等职。虽患重病，但仍为新中国教育特别是工农教育尽心服务。在1950年10月全国第一届工农教育会议上，他与卢正义等人联署提出“建议设立中国文字改革机构和确定汉字注音方案”。他在病榻上继续著书立说，总结经验，撰有《关于识字教学的几个问题》（1950年12月）、《对新学制的认

识》(1951年10月)等文。1959年元月,李廉方因病在武汉逝世,终年80岁。湖北省人民政府庄重公祭,省政协赠送挽联:“遗著犹新与辛亥革命历史共存,此生无憾见祖国社会主义实现。”

十、治学风格 有其特色

纵观李廉方的学术生涯,可以发现其治学风格和特色。

(一)李廉方对学术特别是教育研究有执着精神,终身追求,逐步深化。其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可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从1903—1911年,为从事普通教育时期,也是他学术思想的孕育时期;二是从1912—1930年,为全面开展和研究时期,也是其学术思想的积累成长期;三是从1931—1941年,为从事实验及其推广时期,又是他教育思想的成熟期。他在学术上有三个逐步升级的高峰:1914年、1921—1925年、1931—1937年,其年龄分别是35岁、42—46岁、52—58岁。他约有三分之一的作品是在后一时期创作发表的。这一年龄段即55岁左右,为李廉方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

(二)李廉方治学的范围是很广的,并且这种广泛又是以教育为中心的。在教育研究中,他还注意把多方面的研究与重点学科结合起来。在其200余种作品(尚不完全)中,教育方面占大多数,以学科言之,有教育、心理、文字、文学、历史、地理、政治、民俗、地方史志等;以教育科目言之,有国文或国语、地理、历史、修身、算术、劳作等;就教育形式而言,有小学、中学、大学、师范教育、实业补习教育、义务教育、教育行政、民众教育等;就教育内容结构来看,有课程、教材、教法、学制、经费、教师、学生、教育的目的和过程等。他在教育研究上的主要范围在小学教育上,或者说,在与小教相联的课程、教材、教法、语文教学和实验上。

(三)李廉方的治学方法是多方面的多样化的,主要有教

学、参观、调查、统计、测验、实验、比较、考据、逻辑推绎、历史研究等等。其中实验法在其治学生涯尤其教学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在此方面他是有一套观点和理论的。从方法的原则和思想上看，他很注意把旧学研究与新学研究、理论探讨与实际实验、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学术研究与教学、历史研究与现实结合起来，主张研究的创造超越、中国化、操作化、实效和经济等。这些大致都可归到其方法论中，且与其他思想方面紧密联系。

（四）李廉方在学术上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和风格，就是改革创新精神和科学的批判精神。他从不囿于传统习惯和现行做法，大胆改革，有极强的创造性。翻阅其作品及内容，会发现许多这样的例子。“廉方教学法”的实验和创立，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代表。

（五）李廉方有一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治学风格，是他的吃苦耐劳、坚持不懈和对学术的献身精神。他对官利是淡薄的，曾多次弃官从术。就是有一些行政职务时，他也是尽力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促进自己的研究和实验。不难看出，其教育思想和理论的形成是有一个逐步发展、完善以至反省、痛苦的过程。“廉方教学法”的实验成功，也遇到了许多困难，可他百折不挠，顽强拼搏，坚持不懈，终获成功。最后，引用李廉方于1937年实验中作的一首诗结束本文：

世俗谁知实验难，岁终检讨倍辛酸。
频年炼石天何补，容我传薪路正宽。
海内争相求著述，老来犹自耐饥寒。
今宵合共家人乐，待剪庭燎夜已阑。

注：

①③李廉方：《在镇平讲演录》，开封教育实验区1937年版，第2—

3页。

②李廉方：《改造小学国语课程》（一）“序言”，开封教育实验区1934年版。

④以上见《教育公报》1915年9月，1916年12月，《中华教育界》1914年夹页。

⑤蔡振生：《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反思》，《北京师范大学报》1988年第3期。

⑥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07页。

⑦《教育公报》1921年6月。

⑧《教育研究室设立的旨趣》，《河南教育》1929年12月。

⑨《人民日报》1950年9月23日黄炎培文。

⑩《开封的教育实验》，《教师之友》第1卷合订本1936年。

⑪徐珍：《教学方法演进》，台湾复兴书局1974年版，第102页；司琦：《中国国民教育发展史》，台湾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269页。

⑫李秉德：《廉方教学法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1989年5月。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教委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本文责任编辑：毛华轩）